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中西文学关系的 里程碑

〔捷克〕马立安·高利克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IO-03

14

~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

〔捷克〕马立安·高利克 著

伍晓明 张文定 等译

B556/08



北京大学出版社

B 727511

MILESTONES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 (1898—1979)

by MARIÁN GÁLIK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本书根据 WIESBADEN 1986 版译出。

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

〔捷克〕马立安·高利克著

伍晓明 张文定等译

责任编辑：汪友红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125 印张 265 千字

1990 年 8 月第一版 199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301-01024-9/I·181

定价：4.85 元

序

一百多年前,当比较文学在法国勃兴之时,各民族文学间的关系研究就曾这一学科的主要内容,但当时的研究大体局限在同一文化系统,特别是欧洲文化系统之内。比较文学重镇之一梵·第根就曾明确宣称,对于比较文学的定义来说,“对东方世界不予考虑”^①。然而,科学发展毕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进步,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垄断的崩溃,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及人类面临的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共同问题,世界愈来愈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凌驾于全球的欧洲中心文化封闭体系已经被突破,代之而起的是亚、非、拉美各文化体系的多元发展和与此同步的各体系之间的沟通与融合。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使人们认识到,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相互影响、渗透、沟通的研究不仅绝对必要,而且也许更有启发,更有挑战性,也更富于成果。

在这个基础上,中西文学关系的研究有了突出的进展。这种进展既表现为关于文学思想相互渗透的研究,也表现为关于作

^① 参见《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漓江出版社,1987,第30页。

家作品相互影响的研究。事实上,如果不了解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日本、印度的传播和演变,就不仅难于阐明这些国家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也不大可能对这些思潮本身作出全面切实的评价;正如一位文学批评家所说:“如同在某处被打乱了或突然中断的地质岩系,能在别处发现它在继续延伸那样,文学体裁中的某些发展线索在某一民族的产品中业已在某种程度上清理就绪之后,我们若把研究努力转到别的区域,便能从这一点出发,更好地勾勒出这些发展线索的脉络。”^① 同样,不了解中国诗歌理论和戏剧思想对美国意象派和德国现代戏剧的影响,就既不能对前者作出历史评价,也不能查明后者的发展源流。作家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更是如此。不了解易卜生在本世纪初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就不能真正评价易卜生;不了解鲁迅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对鲁迅的评价就不完整。这些都是文学评论界已经承认的事实。因此,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② 显然,这样做,不仅对于文学史研究,而且对于当前文学发展都会具有重大意义。

马立安·高利克教授的姊妹作《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起源:1917—1930》和《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正是从文学思潮与作家作品两方面对中西文学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扎实而富有开创性的两部名作。高利克1933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城,曾就读于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著名的布拉格查尔斯大学。毕业后曾到中国北京大学留学两年(1958—1960),专修中国

① 引自威廉·佩恩(William Payne),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95页。

② 《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见《读书》,1981年第10期。

现代文学。在北大留学期间,他结识了茅盾等一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回国后进入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成为该所所长——著名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sék)的得力助手。普氏领导的东方研究所突破了只注重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封闭式欧洲传统汉学,开始重视中国现状研究并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研究中国,揭开了欧洲新汉学的第一页。

马立安·高利克教授精通英、德、意、俄、汉多种语言。他的著作除上面提到的两部外,还有用英文出版的《茅盾与中国文学批评》(威斯巴登,1969),《德国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影响》(慕尼黑,1971),还有发表于刊物上的百余篇文章,其中较有影响的如用意大利文写的《1917年前中国妇女的文学作品研究》(1980)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土壤上的欧洲文艺思潮及其变形》(1988)等。

1986年出版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可以说是马立安·高利克的集大成之作,这本书不仅体现了他广博的世界文学知识,他对中国现代思潮与现代文学的深刻思考,以及他训练有素的实证精神与分析能力,而且也蕴涵着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深深的爱。当然,由于作者是在开辟一个崭新的领域,而且是一个范围如此广大的领域,失误在所难免,况且影响研究本身就有很大的难度,要证实某一作家受到何种影响或没有受到何种影响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受到影响,都很难找出确定的准则,某些人看来言之凿凿的东西,在另一些人看来就难免有比附之嫌。另外,作为影响研究,本书对与此密切相关的当代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谈得很少,也不能不说是方法论上的一个遗憾。但本书发掘了大量的史实,开辟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层面,则是确定无疑的。

马立安·高利克教授在1987年8月曾回到北京大学,参加

《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发行仪式,在会上,见到了他的老朋友、北大出版社社长麻子英先生。麻先生在高立克留学期间,恰恰是在北大负责留学生的的工作。当高利克教授提出希望他研究中国文学的著作能在北大这个第二母校出版时,麻先生深表支持及赞同。因此,我们在这里要感谢北大出版社,尤其是麻子英先生,没有他们的支持,本书出版是不可能的。在当今学术著作出版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北大出版社坚持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方针,出版了十多本比较文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和译作,为中国发展比较文学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乐黛云

1989年3月11日

目 录

序	乐黛云(1)
导 论	(1)
第一章 梁启超和王国维:外国现代观念对中国文学 界的第一次冲击	(7)
第二章 鲁迅的《呐喊》:与迦尔洵、安特莱夫和尼采的 创造性对抗	(21)
第三章 郭沫若的《女神》:与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的 创造性对抗	(51)
第四章 茅盾的《子夜》:与左拉、托尔斯泰、维特主义 和北欧神话的创造性对抗	(93)
第五章 曹禺的《雷雨》:与欧里庇得斯、莱辛、易卜生 及高尔斯华绥的创造性对抗	(129)
第六章 洪深的《赵阎王》:与奥尼尔和贝克的文学 间关系	(156)
第七章 冯乃超的《红纱灯》:与法国象征主义	(171)
第八章 何其芳的《梦中道路》:与英法象征主义 和希腊神话的文学间关系	(194)
第九章 冯至的《十四行集》:与德国浪漫主义、里尔克 和梵高的文学间关系	(229)

第十章	巴金的《寒夜》:与左拉和王尔德的文学间关系…	(263)
第十一章	老舍的《西望长安》: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	(294)
第十二章	卢新华与其他作家:“文化大革命”的游历 …	(316)
结 论		(331)
译后记		(346)

导 论

“对抗”(confrontation)一词被著名的匈牙利比较文学家伊什特万·索特尔(István Söter)视为比较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要求人们“在各种最广阔的可能的联系和平行关系中,在其所有重要的运动和关联域中”^①,注意一个民族文学的文学存在与物质存在中的全部现象以及该民族文学的文学间的(interliterary)环境。

本书的目的就是展示 1898—1979 年间在中国文学领域内发生的(与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学的)文学间的(interliterary)对抗过程^②,以及这一过程与世界上其他各种文学——古希腊文学和某些欧美文学,如俄国、法国、英国、德国、挪威和美国文学,以及某些亚洲文学,即日本和印度文学——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希腊、近东、中世纪欧洲的神话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关系。

本书覆盖的时间跨度为 81 年,选择这一跨度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这一跨度的起点与终点恰恰是现代中国文学结构向世界

① 参见索特尔在 Neohelicon 1974 年 1—2 期发表的意见。

② 作者使用“对抗”(confrontation)一词意在强调一位独创性作家在面对外来文学影响时所做出的积极反应。interliterary 指“不同(民族、国家)文学之间的”,翻译时多译为“文学间的”。——译者注

大部分地区的文学结构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开放之时。正如我们将在第一章中看到的那样,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遭受镇压以后,中国文学中出现了新潮流,这些新潮流在20和30年代达到高潮:中国文学家们开始转向西方和日本(稍后是东方)文学,向它们学习,在它们里面寻求文学改良和革命的新动力。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既是本国传统与努力的产物,也是对外国影响的复杂的接受—创造过程的产物——开始诞生。

1938到1940年间以及稍后1944年间关于“民族形式”的一边倒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和延缓了上述这样一个富有成果的文学间过程。^① 这些限制和延缓对于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有严重影响。在当时的讨论中,除了与所谓中国文学的“民族形式”有关的问题以外,还有所谓“洋八股”的问题也属争论之列。当时有些人认为(尽管他们并没有公开断言这一点),任何带洋味的东西都意味着“洋八股”;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意味着从上世纪末一直持续到40年代的所有文学运动,也包括进步的先锋派文学潮流。参加讨论的大多数人一致认定,进入中国文学的“洋东西”根本不是“八股”。他们一致认为这样的“洋东西”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是绝对必需的。

1940年以后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发展表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在自己的系统—结构实体中对于“世界的”或“洋的”因素的利用没有达到20年代和30年代(或者说

① 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中关于“民族形式”主要论争的讨论》AAS,X,1974,pp. 97—111页;Masi, E.: *La discussion sur les “Formes Nationales” dans l’art et la littérature, 1938—1942*. 收入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au temps de la Guerre de Résistance contre le Japon (de 1937 à 1945)*. 巴黎1982,第205—213页;以及Holm, D. L.:《延安无产阶级文学与民族形式》,同前,第215—235页。

1918 到 1937 年间)那样的规模。在 50 年代,中国翻译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和一批批评文章和研究专著,但是这些文学在起源—接触关系(genetic-contact relations)这一领域内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至少是至今尚未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不过这些文学的真正影响也许能从类型相似性的角度加以研究,并获得出色成果。但是,这些都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本书只在第十二章中论述了一个例外的情况。

从 1963 年起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江青(1914—)和姚文元(1925—)为首的极左派控制了文坛。他们是文学批评、创作以及整个文学艺术政策领域的主要发言者。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从 1966 年到 1972 年间,文学中任何一点“洋”东西都遭到全盘否定。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几乎长达 5 年之久的文荒,在此期间,外国文学只能以样品的形式少量流入中国(1973 年到 1977 年秋初)。然后,是中国文学“市场”向外国作品的逐渐开放(1977 年底到 1978 年底),最后,则是 1979 年世界文学研究的迅速复兴和世界文学的大量引进(或重新引进)。①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开放,在最后一章里,我们将看到这一事实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反映”。

在本书中,所谓“里程碑”是指在这两次开放之间写成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那些重要的、开创性的,甚至是最杰出的作品。并非所有这些“里程碑”都被研究者和批评家们或作家本人认为是里程碑。第七章所论的冯乃超的《红纱灯》仅仅出过一版,现在在中国事实上已不为人所知。第十章所论的巴金的《寒夜》30 年

① 高利克:《1970—1979 年间外国文学在中国》,《亚非研究》,XIX,1983,第 55—95 页。Shneider, M. E.:《中国对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的接受》,同前,第 20—26 页。

来一直遭到忽视,只是在其法文翻译成功之后,它的出色之处才在中国得到注意。除了本书这里所分析的作品之外,中国现代文学中尚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也同样可以被视为“里程碑”,例如郁达夫(1896—1945)、丁玲(1904—1986)、徐志摩(1896—1931)、戴望舒(1905—1950)、艾青(1910—)、钱钟书(1910—)等人的作品,论述这些作品需要一本象本书一样篇幅的书才行。

采取比较文学观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迄今还没有问世。只有一些试图在国际文学关联中阐释某些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既有中国研究者作出的也有外国研究者作出的,散见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杂志、文集和专著之中。本书是第一次从比较文学角度向读者提供一个统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尝试,覆盖的时间共 81 年,而这是一个“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的时代,是“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的时代。^①

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起源:1917—1930》^② 一书的姊妹作。它运用了同样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方法(在文学比较范围内),而且它主要从 D. 朱立申^③ 的出色著作中取得理论支柱。它的系统一结构方法也来自于此。

根据他的理论著作提出的目的,本书作者认为必须研究一切有关的语境:中国文学的语境和所谓的超国家的语境,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研究各国文学之间的过程的各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5 页。

②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起源:1917—1930》,布拉迪斯拉发—伦敦,维达—卡宗出版社,1980。

③ 见他的 *Vergleichende Literaturforschung*, 柏林,1972,及 *Sources and Systematic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布拉迪斯拉发,1974。

特点及这一文学间过程的实际结果。如果在本书中用于研究起源—接触关系的篇幅(和时间)大大多于用于研究类型相似性的篇幅,那么这是因为前者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而且在当前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似乎更为需要也更有前途。如果我们没有有关起源—接触关系的充分知识,那么我们就几乎不可能在各国文学间过程中确定中国现代文学的“环境”^①的时空幅度的特质。本书强调接受—创造过程中民族文学的接受语境的选择作用。至于时期的划分,本书是按照中国文学这一进行接受的系统—结构实体中的内在的文学关系划分的。给予与接受现象之间的,或冲击与反应之间的辩证张力在这里被视为创造性的文学间过程中的一种形成性因素。

本书具有明显的反“寻求影响”的倾向。如果作者在本书中使用了“影响”一词的话,那么读者应该记住,本书作者是意识到了有关此词的解释和误释的。“影响”这一概念的内容和范围应当很好地加以界定。把它等同于它的“符号形式”是不对的。一个概念不只是一个术语,意即,不只是它的符号形式。三角形作为一个符号形式与其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作为一个概念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是无法等同起来的。一个概念蕴含着某种思想体系,它愈深愈广,就愈好。文学研究者(每个比较文学家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影响”这一概念)必须脱开它的符号形式,集中注意于它的内容和范围,尤其是要在具体情况中注意这些,他还必须尽力在所考察的语境中,进而在比较文学的框架中对“影响”这一概念作出准确的厘定。我们还应该接受一个更深刻的思想,它来自苏联比较文学家 A. S. 布什明。他在谈到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

① 环境(environment),这里指环绕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环境。——译者注

的遭遇现象中的“文学连续性”时说,“最高的接触—拿来现象应该是无迹可求的,用哲学的话来说,这种‘拿来’应该是一种勾销。”^① 所谓 snyatie (Aufheben, 扬弃) 一词用于黑格尔哲学之中, 意思为某种东西的消灭, 克服, 同时也是这种东西的保存和提升至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按照这样的解释, “影响”就好像是来自作为发送者一方的文学的一个刺激, 这一刺激在作为接受者的文学中被“勾销”和“克服”, 以便它能够在这一文学中被创造性地保存下来, 当然, 是以另一种形式保存下来。如果我们把黑格尔意义上的 Aufheben 一词分解为三个意义成份, 即勾销、保存和提高, 那么很显然, 本书所论的这一文学间过程(可以把它理解为影响)可能意味着一个新现象的产生, 这一新现象在接受者的文学和社会语境中, 主要是在与作为接受者的文学结构的需要和接受主体的创造能力的联系中获得相关性的限定。文学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两难之境。这样一个复杂的起源—接触关系现象必然包括某些损失、某些错误的或不恰当的解决, 因为这种现象的机制尚未被完全了解, 而且这种现象代表着一大堆经常是极其难于解决的棘手问题。

本书第 1 章分析了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史前史时期(1898—1904)的“里程碑”的重要批评著作。第 2 到第 5 章描述 1918 到 1933 年间短篇小说、诗歌、长篇小说和戏剧创作领域中最富于创造性和开辟性的一些作品。第 6 到第 10 章用于 1933 到 1947 年间出版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中的有价值的作品。第 11 和 12 两章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戏剧和短篇小说。

① A. S. 布什明:《文学发展的连续性》,收入《历史的与文学的过程: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列宁格勒,1974,第 160 页。

第一章 梁启超和王国维： 外国现代观念对中国 文学世界的第一次冲击

1842 年是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关系史上的一个显著的界限：中国被迫打开了大门，先是向英国，后是向法国、沙俄帝国、德国，然后又向日本订立了一些条约。开始，这只是发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到了 19 世纪最后 20 年中，科学与文化的领域也被控制了。当然，在那个时期，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仅仅在自然科学、技术和军事科学的范围内，换言之是“西学为用”；而在法律、哲学、制度、文学等方面却仍然必须对面临的欧洲影响作好戒备，换言之，就是“中学为体”。

但是，正像导论中说到的，新的现代趋势的出现恰恰是在 19 世纪末期中国开始在西方和日本的文学中寻找发展的新刺激的时期。在这一章，我们力图展现这个新世纪开始的过程——它改变了落后的体系结构，促进了 1918 年后的中国文学。



梁启超(1873—1929)是闻名中外的政治改革家、文化历史学家、欧洲科学和新哲学思想的宣传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前

期有着坚固而重要的地位。^①

在这里，我们仅根据他在小说理论范围内的观点来说明外国的观念和承传本国传统创作理论之间的互相冲撞是多么巨大。1902年，梁启超写了一篇有深远影响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对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它丰富了那个时代的小说创作。^②在文章开始时，梁氏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③

当时，各种小说创作法流行。梁启超感到在一切事物中，政治是最重要的，在中国文人中，他第一个看到了政治小说的巨大影响。这是在第一篇短文《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的：“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④这是为中国翻译日本作家东方散士(1825—1922)的《佳人奇遇》而写的序言。这也许是19世纪末译成中文的第一篇政

① H. 马丁(Martin):《中国文学观念的转折时期(1897—1917):梁启超论诗歌改良、历史剧和政治小说》(*A Transitional Conc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1897—1917, Liang Ch'i-Ch'ao on Poetry Reform, Historical Drama and the Political Novel*). Oriens Extremus, 1973年,第178—189页;M. 李:《梁启超和晚清文学革命》(*Liang Ch'i-Ch'ao and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of Late Ch'ing*)刊于《亚洲的现代文学和艺术创作》, Angus and Robertson, 1974,第203—224页;吴文琪:《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书林》,1940年12月,第153—159页。

②③ 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1960,第14—19页。

④ 同上,第14页。